

陈黎：用翻译和诗作对接诗歌谱系

本报记者 何晶

聂鲁达、拉金、休斯、辛波斯卡……熟悉他们的人一定也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陈黎，一位翻译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近日，他来到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成为该馆“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第四十二位主讲嘉宾。

1975年，尚在大学的陈黎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庙前》，这本集子里的诗歌一部分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对周遭苦闷环境的反抗。“因冷，需要睡眠/深深的/睡眠，需要/天鹅一般柔软的感觉/雪松的地方留下一行潦草的字迹/并且只用白色，白色的/墨水/因他的心情，因冷/而潦草/白色的雪”（《雪上足印》），诗里是潦草、冷寂的情绪，同样显露的还有他的诗歌日后的某种趋向：奇怪的因果律——“因冷而潦草”，明显的悖论——“白色的墨水”。

《庙前》诗集里的另一部分诗歌则显示了他从小就有的对中国文字做视觉性组合的兴趣，他将语言进行有意味地排列，对诗歌形式进行各种嬗变和实验。这与他得到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送的一本过期的《芝加哥评论》——1967年出版的“图像诗专号”不无相关。从1995年写就的《雪上足印》B版可以一窥他这种诗歌语言和形式嬗变的样态，几行长短不一的“……%”符号及其变形体构成了一首诗歌，很难解释诗歌的意义所在，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以图像展示了雪上足印的形状。但陈黎表示，图像诗与文字游戏完全不同，图像诗更多的是一种图像式的组织，意味自在其中。

写诗伊始，陈黎就受到了西方诗歌的影响。彼时，现代诗盛行，为了学习更多的现代诗，他发狂般地搜集一切中外现代诗的资料，与他向知识一向的狂热表现相同。“不要小看了一个人对知识的渴望，我当时希望鲸吞所有的知识，又没有互联网，所以我买了几乎所有的百科全书。”大一、大二时，陈黎花了很多钱买下日本集英社出版的《近代美术全集》，尽管全日文，



但对知识的渴望促使他用尽办法将全书看完。这种渴望延续到他的翻译上，“我翻译辛波斯卡是从波兰语直接译过来的，有人说你又不懂波兰语，怎么能翻译呢？我虽然不懂波兰语，但从小我对什么东西渴望时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哪怕用嗅觉，我也要将其翻译出来。”

陈黎第一个翻译的诗人是拉金。“我们都知道艾略特、叶芝，他们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诗风，但奥斯维辛之后，你还可以写高度现代主义的东西吗？你当然会回归到日常的生活，拉金的诗不怎么诗意，但他从不漂亮的事物里发现了新的东西。”拉金的诗影响了陈黎，他的诗里也有粗鄙的东西，“但平淡、庸俗的日常里，要发掘新的诗意”。

大学时陈黎读英文系，因为报不上热门的法语作为二外，他选择了西班牙语。毕业后他去服兵役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拉丁美洲诗歌，其中包括对他影响至深的聂鲁达。经过青涩的学徒期，他开始有意识地展现自己诗歌与广博的阅读源头之间的呼应。《最后的王七木》里，陈黎才用聂鲁达

《马祖匹祖高地》一诗的写法：没有动词和明显的句子形式，多用名词结构的罗列来彰显磅礴的气势，写矿难的现实问题。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密集的诗歌翻译工作开始了，翻译与诗歌写作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陈黎与西方诗歌谱系之间的对话关系也越来越明晰，“我常常问自己，我是受到西班牙语的聂鲁达的影响，还是受我翻译的聂鲁达的影响？仔细思索后，我发现我还是受我自己翻译的聂鲁达的影响”。

诗人余光中是陈黎的老师，他译介的《英美现代诗选》给予陈黎某种感召，因循老师的足印，陈黎翻译了《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也正是在翻译中，他意识到，中国台湾现代诗发展的过程是拉丁美洲现代诗史的缩影，只不过晚了二十年，同样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保持本土的特色。拉丁美洲诗人用魔幻现实主义保持了本土的东西，陈黎更多的是想用本土元素来进行应对。他在《岛屿飞行》这首诗里如聂鲁达在《西班牙什么样子》里列出52个西班牙乡镇名字一样列举了95个中国台湾山名，甚至在更多的诗歌里他用中国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来架构自己的诗歌。

1993年，陈黎写下《岛屿边缘》一诗，“在缩尺一比四千万的世界地图上/我们的岛是一粒不完整的黄纽扣/松落在蓝色的制服上/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缕比蛛丝还细的/透明的线，穿过面海的我的窗口/用力把岛屿和大海缝在一起……”这首日后被学术界不断阐释研究的诗作，某种程度上标志了陈黎诗歌学徒期的终结。通过翻译转化而来的诗意在这首诗歌里找到了对接的路径，它是整个诗歌谱系的养分对本土现实的承载。

在这首诗里陈黎有一种“在地化”的想象力，他将中国台湾比喻成“松落在蓝色制服上的黄纽扣”，它除了是地形意义上的纽扣之外，还有另一个隐秘的存

陈黎诗选

花莲

以浪，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与黑潮，后花园后海洋的
白浪好浪，后浪，后山厚山厚土
厚望与远望，以远远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极而泣的泪海，以海的海报
晴空特报，以浪……

上海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我从花莲
上海街来到上海街上
在城隍庙星巴克坐下
喝一杯焦糖玛奇朵
上海老街甜甜地变焦为
上海街。上海在我的
舌尖
在我的鼻尖是比整个外滩
还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棉花酒吧里笑语如棉花
很轻。海上灯火明灭如花
以不时流逝出的暗香开示我这个
自动从花莲来补修上海学的学生
轻盈，真好。
上海自学生生活活生生学自海上

在——它记录着人类的经验和记忆。更有意味的是，诗中对“我的存在”有三种比喻，最初是“一缕比蛛丝还细的透明的线”，继而是“我的手握住如针的我的存在”，最终这颗纽扣“用力刺入蓝色制服后面地球的心脏”，关卡的设置、比喻的转换，让这首诗获得了突然的力度。正是在这首诗里，陈黎将家族背后的疯癫史、底层的民间经验全部容纳在内。

抛开才女之名，认识真实的李清照

汉学家艾朗诺携专著《才女之累》作客上海

实习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郑周明

提起宋代才女李清照，很多读者首先会想到她与赵明诚之间的伉俪情深。在“千秋”以来积淀的先人之见影响下，一个早年清纯可爱，老年饱经风霜、脆弱敏感且颇有才情的痴情女子成为了李清照的流行形象。在我国关于古代文学史的大部分教材中，李清照的介绍寥寥数语，作为作家的她一直游离于文学史之外。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研究者不断增多，李清照研究重新成为学界的焦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陈祖美的《李清照评传》以及邓红梅的《李清照新传》都成功地将易安居士重新推向公众视野。在海外，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汉学家艾朗诺的专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备受关注，被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赞为“迄今为止关于这位中国古代最著名女作家的最好研究”，也可能是我目力所及最好的研究”。近日，艾朗诺携中文版新书作客上海古籍书店，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女性作家——李清照。

艾朗诺直言，千百年来，对于李清照，学界和大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李清照的真实形象被扭曲。这种变化往往是基于满足后代对伟人想象的要求。他以孔子形象的演变例证，说明了从汉代到清末再到现代，孔子形象在不同年代之间的差异。同样，当今关于李清照的流

行形象也与这位女性作家的真实面貌之间有着相当的差距。其中，争论的核心便在于她的再嫁事实。在宋代，寡妇再嫁并不少见。但作为在文学史上留痕的女作家，李清照的再嫁有损其形象。对以前的学者来说，李清照是他们从晚清继承下来的李清照，她有着相当保守的形象：一位对赵明诚有着生死不渝之爱恋的女性，一位在守寡生涯中完全不会动再嫁念头的女性。在我国现有的四座李清照纪念馆中，也可见那个侍奉夫君赵明诚的李清照塑像，再嫁事实一直被规避。

此外，对于李清照的解读，学界普遍以女词人定义这位女性作家，将女词人的词作与其生平一一对应，认为《金石录》后序是她的怀旧之作，通过自传式解读把李清照脸谱化。艾朗诺强调，事实上，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词作，也包含大量诗歌，还著有学术作品《词论》。由于她的全集早已失传，导致当今研究者对她的了解主要集中在词作上。与“诗言志”的诗歌创作传统不同，词的创作有更多想象的空间。词是否就能代表她创作的最高水平，能否直接代表她的人生经历，目前均不能给出定论。与此同时，明代以后，还有很多艺术水准一般的无名诗作归于李清照名下，很大程度上再次混淆了读者对她的了解。艾朗

诺认为，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男性作家词作时，往往能够把作品与作者分开，更深入地分析文本的内涵。但一涉及女性作家，例如李清照，研究者就将作家与作品中的声音完全对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他指出，这是当今研究者对女性作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不尊重。这种将女作家创作单纯化，将女作家脸谱化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误读，加速了对李清照形象的扭曲。

真实的李清照到底是怎样的呢？她与流行中的李清照形象又存在哪些差别？艾朗诺笑称，李清照是一位自信要强、敢于迎难而上的女强人。她非但不柔弱，反倒坚强自主。在宋代代理学的压制下，李清照仍然凭借自身才华突出重围，成为了宋代文学史上重要一笔。她不仅聪慧过人，记忆力超群，在创作中也十分刻苦，曾在大雪天出门寻诗意，与赵明诚比试也是常胜将军。在《词论》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她对当时词坛上重要的男词人逐一批评，充分显示出她对自身作品的自信，也侧面反映出她的勇敢。为了立足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李清照始终保持她的孤绝，坚持创作，在傲人的天赋外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李清照始终以独立的精神出现在文坛上。在赵明诚死后，她选择了再嫁，但婚后发现男方在科举

中舞弊，便毅然决定离婚。在当时，她为了离开这个品行不端的男子，以入狱为代价检举男方的罪行。这种独立与果敢的精神，哪怕置于当下社会，也值得称赞。她的改嫁与离婚将她从赵明诚之妻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更独立地以作家的面貌，凭借作品出现在后世视野中。这种精神也延伸进她的创作中。她笔下的女性不再是男性词人笔下模式化的平庸女人，她细细描绘笔下女性的形象思考与感受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写法，她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使得传统题材在易安笔下独具一格，她创造出了同时代女性作品中未出现的女性。

在讲座中，记者从艾朗诺的研究方法中发现了一些不同于国内研究的新特点。作为一名海外汉学研究者，艾朗诺在讲座中多次强调他的研究得益于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他表示，目前国内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海外汉学研究者新观点总是得益于西方文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实则不然，他强调自己并不依赖西方文学理念，力求避免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在他看来，海外研究者研究中国文化拥有从外向内看的新角度，这个角度往往能够带给他们异于国内研究者从内部看自身传统的新体验，从而获得一些意外收获。